

革命中失落的遗产： 五四中的女性解放

庄几 / 文 2019 / 5 / 6

五四一百週年 × 當下思考與運動專輯



思想與運動的交匯處
WWW.REIGNITEPRESS.COM



五四一百週年 × 當下思考與運動專輯

2019/5/3

〈五四一代人的“爱国”，你我真懂吗？〉
〈到底谁是“新”儒家？——论五四的文化自信与当代中国〉
〈五四青年給今日“不激進青年”的一個大抱抱〉

2019/5/4

〈五四青年的工学实践〉
〈五四一百年，民主路何其遥远？〉

2019/5/6

〈革命中失落的遗产：五四中的女性解放〉
〈五四之后如何回看工学联盟？
——在思想与实践辩证中“干”出来的革命〉



更多專輯文章請見 WWW.REIGNITEPRESS.COM

编案：

“怀火”是一个致力于交汇思想与运动书写的平台。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际，“怀火”的青年作者在重新阅读五四历史、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当下的思考与社会运动，通过回看五四来重思中国大陆政治、社会、文化与精神现状。我们试图把五四从官方宣讲、历史教科书和纯思想史与历史论辩中“拯救”出来，让更多读书从五四的不同面向获得对当下的启发。

“五四一百周年×当下思考与运动专辑”将在接下来的几天陆续推出：

#爱国主义：从五四时期“爱国主义”作为回应被问题化的西方现代性的产物，探讨彼时“爱国主义”的丰富意涵及其当下的扭曲；

#新儒家：在剖析新儒家对五四、中西文化、民主与政治的论述基础上，批评当下由国家主导的儒学复兴；

#青年：从五四时期青年成为重要历史角色的脉络出发，以五四青年精神状态的“背面”为资源，寻找今日“不激进青年”政治化的契机；

#民主：从五四至今关于民主的思考与实践，讨论今天我们如何继续未完成的民主；

#工学联盟：学生在面对工人时，逐步透过实践与理论的辩证，与工人相结合

一、 导言

在八〇年代的学者们对五四启蒙遗产的种种再反思的论述中，似乎“德先生”和“赛先生”被建构成为五四唯一的主题。当代对五四的回顾中对历史中性别议题的忽视，恰恰反应了女性解放是一个在今天都尚未完成的命题。关于女权与妇女解放的议题在五四时期被极为广泛地传播与讨论，各种女权运动在那时开展得如火如荼，然而一百年过去了，今天关于五四的讨论中缺失的性别议题令人产生历史倒错的错觉，不能不说是一种对比和讽刺。这一百年中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一重要的遗产蒙尘，不仅没有如民主一般在八〇年代获得复兴，甚至直到今天都被压抑？让我们回到五四的历史现场，探寻五四时期女性解放的话语及发展，以

及五四留下的遗产在紧随其后的革命中，在革命“成功”后所面临的困境。当我们开始询问，在五四中高举个性解放的女性，她们的革命面临怎样的结局时，生活在这一历史结果中的青年，才能在百年后继续这条未完成的路。

二、五四新女性：从娜拉说起

郝尔茂：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

娜拉：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

——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

——易卜生《玩偶之家》

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杂志推出了一期精心设计的“易卜生专号”，刊载了胡适与罗家伦合译的《娜拉》（《玩偶之家》）。娜拉“砰”地一声关上大门的巨响随着她毅然出走的背影迅速传遍了全国。女性解放的讨论开始在五四时期的大众媒体

中进一步发展，作为“为近世妇人问题之解决做先导也”的娜拉形象成了一面映照五四中性别议题的镜子。她承载着女性解放与个人主义的诉求，又与反抗礼教、反对传统、伦理重建、社会流动等问题天然地联系起来。

晚清以降，中国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有识之士面对严峻的现实情况下的焦虑与迫切需求，许多人开始自觉地通过翻译大量引入西方的现代思想文化。易卜生与他笔下的娜拉就是在这样的潮流中被译介入中国的。五四知识分子视娜拉为思想启蒙与“人的发现”的典范。男女青年以其为脱离家庭束缚的精神榜样，“新的人没有一个不狂热地喜爱他……在中国妇女中，出现了不少的娜拉”。娜拉出走的对抗不仅是文学情节，而意味着一种现实的可能性，召唤着代表着“现代”的新女子的诞生。

而现实中的“娜拉事件”则直接将女性解放的现实问题展现在公众眼前。1919年8月，一个名为李超的北京国立高等女子师范学校的广西籍女学生因“觉得旧家庭的生活没的意味”与逃

离婚姻被家人断绝经济来源并在贫病交加中身亡，年仅二十三、四岁。此事在当时引发了极大震撼。她的追悼会场“男女约共千人以上，会场几无立足之地”，发表演讲者包括蔡元培、胡适、陈独秀、李大钊、蒋梦麟，几乎可被称为“女子问题的讲演大会”。

勇于逃离家庭的娜拉成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偶像，说明新文化运动时女性议题的侧重点与晚清民初时的情况有所不同。如果将目光放到晚清兴女学、倡女权的运动中，我们可以看见，金天翮在1903年的《女界钟》中呼吁：“善女子，誓为缙紫，誓为木兰，誓为聂姊、庞娥……誓为越女、红线、聂隐娘。善女子，誓为批茶，誓为娜丁格尔……誓为马尼他、玛利侬、贞德、韦露、苏菲亚。此皆我女子之师也。”这些女性都带有相似的特质：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与国家情怀。我们还可以看见秋瑾在革命前夕所作的《勉女权歌》，同样倡导民主精神与革命救国。然而在政治革命后，女性却依然面对着来自婚姻与家庭的压迫，胡适概括娜拉的家庭有“四种大恶德”：“一是自私自利；

二是依赖性、奴隶性；三是假道德，装腔作戏；四是怯懦没有胆子。”对家庭及宗法制度等等令人压抑的传统社会关系的激烈批判，对个人自由与权利的渴望与呼唤，构成了五四时期女性解放议题转向的重要背景。

在这一段时间，知识分子引用西方人权观念论证人不可剥夺的自由权利以抨击愚昧、落后的儒家传统，这一立场势必要将女性包括在内，呼唤女性的人格独立。1920年，陈望道在《妻的教育》中引述《玩偶之家》道：“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谁配拿模型去铸造女子，而且铸造适于男子的女子呢？”贞操观、包办婚姻等正是旧文明压迫女性的证据。“妇女问题”的意识在五四时期飞速攀升，达到最为广泛的传播与普及，大量报刊大篇幅地谈论女性问题，使之成为了公众讨论的焦点。随着“自我”的觉醒，自由恋爱、婚姻自由等现代价值的追求接踵而至，要实现独立的个体价值，实现社会关系与社会生活中的男女平等。

三、女性解放话语的深层阐释

1. 娜拉走后怎样？——女性解放的进一步追问与行动 2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彼时呼吁女性与封建家庭决裂的声音还在高涨，而鲁迅“娜拉走后怎样”的追问，在方兴未艾的出走热潮上浇了一瓢冷水。他提出尖锐的问题，出走的娜拉仍有可能为了钱而卖掉自由，而她的未来也许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鲁迅的进一步追问，将女性解放问题带入了一个更为广阔且具有争议性的空间。启蒙话语中出走与获得自由的必然性被切断了，原来不是完成那象征性的脱离就能摆脱一切束缚。现实并不如启蒙话语中的自由与反叛之梦那样快活，意识到自身的处境并不能回避现实中权力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缺失。鲁迅虽然在演讲中谈到经济自由的重要，但他并未简单地将女性解放的问题追问到经济权为止。即使从经济权的获得来看，女性的解放也必

须要通过整个社会现有经济、政治制度的彻底改造才可能实现。“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推动。”

但鲁迅显然对战斗是有信心的。他说：“在真的解放前，是战斗”。故而不难理解，为何经过五四洗礼而成长的“新女性”不仅要个人逃离家庭，还积极参与了社会运动。实际上，五四运动首先见证了女学生作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群体的兴起，参与社会运动使得脱离传统家庭婚姻的女性获得了新的公共身份。在 1919 年后的几年中，妇女运动开始出现。这段时间内，出现了许多由妇女管理的妇女杂志，在公共参与中，经过五四话语洗礼的“新女性”，也就是在学校接受过教育的年轻妇女们，聚集在新文化运动活跃的大城市。起始于 1921 年的参政运动中，湖南、广东和四川的女性开展有组织的妇女运动争取平等的政治权利，被写入地方军阀政府的自治法中，开始有女性被选为议员。1922 年掀起了全国性的妇女参政运动的浪潮，两个参政运动的主要组织，女子参政促进会和女权运动同盟会发

表了不同的纲领。后者发表的宣言注重性别的阶级维度，并且试图联合不同阶级的妇女，她们不仅要求平等教育与职业权利，还特别要求为工厂女工设计同酬和保护性的法律，并要求禁止买卖奴婢等，从而将底层妇女也纳入了这一场运动中。由于这一新群体在公共领域的活跃，新女性成为了国共合作的革命试图吸引的对象。男女平等作为一项原则，在那时也已被纳入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政治纲领。

另一个妇女开始参与社会运动与革命的重要原因是，她们所接受的五四的启蒙话语中的女权主义和大量的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话语结合在一起，强调女性要成为和男性一样的具有构建现代价值的“人”，而没有被规定成为男人的他者。这使得妇女希望成为一个能为民族作出和男性同等贡献的现代国民。在二〇年代，它促进了受教育女性在公共领域中进行社会变革，也打破了高等教育和职业中的性别隔离。然而，我们也将看见，五四女性解放话语中，以女性为“人”的去差异化性别平等这一特征因为符合革命和建设现代化民族国家的需求，被一直保留到毛时代，毛泽东

自豪地宣布：“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男同志能办到的事，女同志也能办到。”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这种男女平等依然是以男性的普适为准则的，如文革中的“铁姑娘”，对许多女性的去性别化的鼓吹最终成为了一种压迫。

2. 女性解放背后的现代性国族叙事——民族寓言

五四时期是一段特别的时期，其思想的自由迸发，知识分子与学生参与文化的改革，妇女有组织的运动的发展，都源于其特殊的政治环境。但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国民革命开始后，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共同体意识的构建逐渐使五四时期的自由思想走向终结。

标志着个人觉醒而出走家庭的新女性，被收编进入整一的国族叙事，最终成为革命动员的象征，走向工农大众。这一转变看似突兀，实际上五四的个性解放下隐含的国族叙事在革命的肇始就已经埋下了伏笔，1911年的政治革命没能建立一个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知识分子转而寻求文化之路以振兴民

族。新文化运动中的知识分子们最初采用的西方自由主义人道立场被视为是解放个人的强有力的工具，然而必须认识到这种策略的最终目的，在个人与女性解放的口号之下隐含的话语中，女性解放也被描述为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妇女被视为尚未开发的占中国半数的人力资源，一个民族一半人口的平等与发展最终能提高民族国家在现代世界中的地位。胡适认为娜拉的独立人格，是现代文明的基础，不但在个人解放中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它是社会和国家改良进步的希望。李大钊将女性解放视为现代民主精神的一部分，“妇女解放与 democracy 很有关系，有了妇女解放，真正的 democracy 才能实现”。

摆脱原有的束缚仅仅是一个“破”的过程，将女性解放纳入启蒙与现代化的整体规划中，才是成为一个成为新公民的“立”。女性解放与现代化和建立民族国家的关联，使得女权的话语从一开始就被启蒙的宏大叙事所整合并分享。在这之后的革命与国家建设中，五四中极为突出的性别议题，逐渐被吞没于更宏大的目标和叙事中。女性解放成为了一个民族寓言。

四、五四遗产的失落：女性议题的边缘化

1. 五四女权主义话语的衰落

二〇年代中后期，随着民族主义和左翼思潮的兴起，个人主义不复五四时期的辉煌。虽然两党都将女权主义的议题涵盖于国民革命中，但妇女解放的定义开始随着思想与政治潮流的变化而变化。这不仅造成了非政党的女权运动空间的缩小，而实际上妇女解放的诉求也并未在两党的革命计划中占据重要位置。

孕育于五四话语中的女权主义，在共产党一边联合女性参加革命时，一边遭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剧烈的抨击。在1923年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妇女的决议中，清晰地提出要采纳当时流行的五四女权主义话语与议题去联合妇女组织。马克思主义的诉求不再满足于个人的解放，转而强调社会主义的革命。中共妇女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向警予，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温和的参政运动所代表的自由女权主义进行了猛烈批判：“参政运动成了功，一班桀黠的妇女趁机闯入北京或各省的猪圈伙同

一般男性的猪仔干那祸国殃民的勾当。”她强调，中国妇女参加国民革命是政治必要。郭沫若的观点或可作为一种典型叙述，他虽认为“女子和男子同是一样的人”，然而“本来女权主义只可作为社会主义的别动队，女性的彻底解放须得在全人类的彻底解放之后才办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分析框架下，性别问题不如更为紧迫的阶级问题重要，仅仅关注个人的权利被贬低为是自私和狭隘的，中国妇女只有一条正确的路线，那就是无产阶级妇女解放运动。至此，中共将并存的民族主义话语和五四女权主义话语对立起来，将“妇女解放运动”与“女权运动”划清界限，通过垄断对“真正的妇女运动”的界定，五四时期的个人主义的女性解放话语和女权主义在革命政治中彻底失去了合法性。

当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革命呼唤盖过启蒙的声音时，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向晚清民初的女性解放“回潮”的现象，对娜拉的解读在这时开始带有批判的意味，茅盾 1929 年创作的小说《虹》的主人公就不满足娜拉仅仅意识到自己是女性，而“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浓郁的女性和更浓郁的母性”，“准备把身体交给

第三位恋人——主义”，女主人公完成了时代女性的革命化进程。到了1936年，夏衍创作了三幕剧《秋瑾传》以其投身于革命行动来激励女性。显然，追求个人独立的娜拉已经衰落，在革命中值得颂扬的是将自己投入民族解放的鉴湖女侠。

2. 革命中女性地位的边缘化

实际上，参加革命依然是许多女性的选择。革命为五四之后逃离家庭的女性提供了避风港和一种新生活。在五四的女性解放话语为出走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时，革命为她们提供了一个实体基地。当长征的女红军说出“党就是我的家”时，这句话在当时并不带有作秀的成分。革命给了妇女一个崇高的目标，党组织则是一个真实的、接纳女性的、为其提供归属感的群体，参加革命，如同参加到一个激进的亚文化群体中。

从黄定慧的口述中也可以看到，性别议题在一名女性决定成为共产党员的问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基于个人解放的五四女权主义话语在革命中被压制，取而代之的是集体主义

的重构：为更宏大的目标——国家、人民做出服从与牺牲。以向警予为例，她作为中共妇女运动的领导者已经得到充分认可，但据其丈夫蔡和森所言，她依然常常感受到党内无形的压迫，认为女同志能力不如男同志：女共产党员只能做“妇女工作”或常被安排做地下党的“联络”工作，这无疑是一种性别隔离，不让女性担任指导工作实际上使得所有女性在革命叙事中被边缘化，远离党的权力中心。黄定慧被党指示从事地下党工作，遭受丧子之痛，并和党外人士保持亲密关系以便利用其关系网开展营救工作，但她的贡献最后却并未被承认。甚至被其他男性共产党领导人贬低为“攀高枝”。关键不在于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冲突，而在于往往是女性革命者，被号召和安排去做边缘的从属性工作。而妇女在革命中居然失去了性别政治的发言权。

这也是为什么妇女在革命中的美德被强调为忠诚，尤其是她们通常以牺牲自己的家庭为代价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因为党内的性别比例，大部分女共产党员都有丈夫和孩子，但

是她们却被要求不把自己视为妻子或母亲，而首先视为共产主义革命者。她们对家人的爱要从属于对党的爱，否则她们就不是无产阶级，而是资产或封建阶级的。正如黄定慧的故事所展示的，妇女在这一层面上被化约为无性别的无产阶级革命者。

女性在革命中被边缘化且失去了为自己辩护的合法话语的问题不仅没有在革命完成后被解决，反而在 1949 年后，被中国共产党的妇女解放神话所掩盖。王政认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公众记忆仅仅被建构了三种 1949 年前的妇女典型：参加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女英雄；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受害者、被中共解放的妇女；颓废、寄生、剥削的资产阶级太太，被革命所消灭。

其中，普遍的创作主题是妇女受害者转化为革命女英雄。她们都是共产党员，而她们的贡献是对党和革命的无私与忠诚。她们过着献身于伟大事业的生活，这种奉献往往是以牺牲家庭为代价的。也存在着被赋予其他特殊含义的共产党员女英雄叙事，向警予因她在中共妇女理论的贡献受到颂扬，但这等

同于宣告中共妇女解放路线的成功，与其他的、错误的女权运动的失败。女英雄的叙事加在一起抹去了其他非共产党的妇女的公众记忆。因此，对共产党女英雄的颂扬与对非共产党妇女的主体性的抹杀结合在了一起。颂扬与抹杀并存，形成了一种宰制叙述（master narrative），创造并维护了中共在女性议题中主导地位合法性。

五、结语

“女权主义”在五四时期的女性解放话语中是一个积极进步的词汇，却在历史中降格，成为意义晦涩不明的贬义词。共产党在革命早期的策略在之后一直留存了下来。它拥有定义“feminism”的权力，在共产党关于妇女运动的历史文本中，“妇女运动”与“女权主义”是两个含义不同的词汇，通过对非官方的女性话语与运动的驳斥，女权主义成为了一个西方的、资产阶级的形容词，被排除在合法的革命、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之外。在后毛泽东时代，新一代女权主义者们试图用“女性主义”

破除官方对女性解放的话语的垄断，从词语的变迁中，能够窥见不同力量对女性解放的不同理解和定义。

革命中的女性解放问题不应该仅仅被放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之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二元框架下被讨论。或许我们应该承认，五四的女性解放话语中潜藏着的危机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对妇女解放的表述有一点是同构的：妇女解放总是被视为是为更大的目标服务，而将妇女解放本身作为目标，或哪怕是作为与其他议题同样重要的问题而进行的活动，总是被贬低为狭隘的。妇女运动只有依附于最重要的伟大事业，不论是推翻封建主义、救亡图存还是推进民族现代化，才能在主流话语中占据合法地位。女性解放的议题自五四时期的发展之后，在二〇年代中后期的革命中被不断边缘化，最终被笼罩在1949年后妇女解放的神话阴影下。

重新反思五四运动中女性的位置，必须正视这一尚未完成的进程。女性解放的议题逐渐失声，女性的视角在历史书写中被悬置，这一切都召唤着我们继续这场尚未完成的革命。鲁迅

近百年前提出的娜拉出走后怎么办，至今还是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从历史的经验中，我们至少可以走出女权主义运动与革命的纯然绝对的对立。今天，在生产领域进行的工人运动与再生产领域中的女权运动的结合与交集，也许会为我们带来新的可能性。二者的结合，才能带来个体自由与社会真正的改变。

参考文献

《女权运动同盟会宣言》，载《妇女杂志》1922年第8卷第9号。

《昨日李超女士追悼会情形》，载《晨报》1918年12月1日

胡适（1918）《易卜生主义》，载《新青年》第4卷第6号。

——（1935）《导言》，收《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

鲁迅（1923/1981）《娜拉走后怎样》，收《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向警予（1924）《今后中国妇女的国民革命运动》，载《妇女杂

志》第10卷第1号。

王政（2011）《五四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见

<http://www.chinadevelopmentbrief.org.cn/news-15413.html>

张春田（2013）《思想史视野中的“娜拉”：五四前后的女性解放

话语》，台北：秀威。